



# 冲突与融合 战前澳洲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研究

汤锋旺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随着华人移民不断迁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华人社会与当地民族的社会经济交往不断扩大。然而白澳政策的确立使得华人与当地民族的融合进程受阻,华人与当地民族在各方面产生碰撞与冲突,冲突与融合并存成为此时澳大利亚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特征。同时,这种民族交往当中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历史经验成为了澳洲华人整合华人社会以适应澳洲主流社会的资源,被动调适抑或主动融合则皆是澳洲华人社会融入本地社会的运作方式。

**关键词:**澳洲; 华人; 民族关系; 冲突; 融合

**中图分类号:**D693.73(61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2-0092-06

最先到澳洲的华侨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然而,伴随着劳工出国的合法化以及淘金热潮的涌现。自 1848 年第一批华工从厦门抵达悉尼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前往澳洲谋生。<sup>[1]</sup>可惜好景不长,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蛰伏的排华情绪开始蔓延,华人在澳洲社会遭遇普遍抵制,生活境况甚为艰辛。澳大利亚排华政策背景下,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正常交往受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冲突与矛盾层出不穷,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番情势之下,华人社会采取主动或被动地整合与发展策略,以化解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嫌隙。冲突与融合成为澳大利亚排华政策下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一体两面。当然,这种民族交往的历史经验也为澳大利亚华人社会的整合留下资源与空间。

## 一、经济领域的冲突与交往

随着晚清政府《北京条约》的签订,契约华工出国合法化,华工从厦门、汕头等地被输送往澳洲。从 1848 年至 1852 年有几千名契约华工被带到那里以满足畜牧业者对廉价劳动力的要求。<sup>[2]</sup>1852 年,当澳洲发现“新金山”的消息传回中国后,立即掀起了一股移民澳洲的热潮,源源不断的淘金客从闽粤两省港口输往澳大利亚。至 1861 年,澳洲华人移民人数已接近 40,000 人,占到澳洲总人口的 3.3%。<sup>[3]</sup>然而,此时在金矿区驱赶华人的动作已经愈渐频繁。自 1855 年维多利亚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后,南澳、新南威尔士步其后尘也相继出台排华法案。鉴于当时各殖民地排华法案的不统一,华人还可以利用法令空隙在各地区间流动。于是,各殖民在 1881 年联合起来先后召开了

三次大洋洲洲际会议,借此统一各殖民地的排华步调。<sup>[4]</sup>到 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澳洲各州的排华进入统一的阶段。与此同时,金矿的开采已经接近枯竭,华人矿工开始向种植业、商业、贸易等其他经济领域扩散,经济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与当地民族的经济交往渐趋频繁。华人与当地民族在经济领域的交往呈现出竞争与协作并存的景象。只是在排华政策背景下,华人与当地民族的经济协作被他们之间的经济竞争所掩盖。

在生产领域中,华人劳工阶层触及的行业包括种植、家具以及制糖等方面。其中,尤以种植业中华人人数最多。据当时的人口调查显示,从 1901 至 1921 年间,华人菜农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两地占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sup>[5]</sup>华人菜农的人数亦远远超过欧洲菜农。而且,华人在种植业方面具有天赋,加上自身的勤劳耕作,很快便在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引起欧洲菜农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华人菜农所出售的蔬菜和水果价格太低,是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随着情势的发展,这种情绪愈来愈走向偏激。他们对华人菜园的卫生条件提出抗议,并发出“要过多少年市政会议才能最终决定将华人菜农赶出去”的抱怨。<sup>[6]</sup>在白澳政策背景下,华人菜农的处境不断恶化。由于华人菜农所种植的土地为白人所有,他们因此对华人种植园的巧取豪夺。1919 年,一名叫做方劲(Fong King)的华人在照看农场时,白人地主格里菲斯·罗伯特及其妹夫阿姆斯特朗进来肆意夺取园内蔬菜,方劲上前阻止而与两人发生争执,因势单力薄而被拳打脚踢,在自卫的情况下开枪将格里菲斯打死。<sup>[7]</sup>最终,方劲以过失杀人罪处以五年徒刑。此外,种植业中华工与欧洲工人的冲突也有。

作者简介:汤锋旺(1985-),男,福建福安人,厦门大学世界史博士生。



1929 年,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的华人种植园亦发生华工与白人冲突的事件,一个名叫贝利斯的白人将华工打成重伤后被警察带走。<sup>[8]</sup>华人与白人的冲突持续蔓延最终演化为暴力性事件,攻击华人种植园的事件屡见不鲜。

在种植业外,家具制造业也是华人与当地民族激烈冲突的领域。华人细木工被欧洲工人视为威胁。因为华人细木工工资低廉,工作效率又高,为家具制造业主所喜欢。当欧洲工人反对华工时,工厂主常常与华工站在同一战线上。当华工与工厂主出现矛盾时,华人细木工则以罢工的手段来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当华人细木工罢工胜利时,欧洲工人只是以旁观者视之,而不是与华人细木工一同庆祝。<sup>[9]</sup>在种族矛盾渲染下,阶级矛盾被弱化了。这种情况显然对华工非常不利,因为华工将要同时承受来自种族的歧视和阶级的压迫。而且,联邦政府自 1898 年出台工厂与商店法后,华人家具制造业主与当地人的关系更加不容乐观。联邦政府对华人家具制造业百般阻挠,规定了诸如华人家具制造业主不能雇佣华人;雇佣欧洲工人则必须付租额法定工资;<sup>[10]</sup>华人生产的家具必须刻上亚裔工人制造标签等歧视性法令。华人家具制造业因此被置于不平等的位置。这种介入实际上自然不利于华人与白人这个领域的经济交往。除了种植业、家具制造业外,其他生产性行业中华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冲突亦有不少。

尽管华人与当地民族在生产领域中存在诸多矛盾,然而也可以发现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友好交往。华人种植业是华人主要从事的生产性行业,它已成为澳洲当地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华人菜农不仅向华人零售业主提供蔬菜,也向欧洲人的商店供应。当白澳联盟开办起专门向白人供应蔬菜的商店时,发现只能从华人那边获得蔬菜。<sup>[11]</sup>这也足见华人种植业经济已经成为澳洲国民经济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如此,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种植业亦是赞赏有加。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公认“华人菜农将很好的服务工作献给社会”。各地居民也公认“华人菜农刻苦耐劳和具有很大的忍耐心”,而受到白人的爱戴。<sup>[12]</sup>但是,相对于华人与当地民族冲突来讲,这种赞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相较于劳工阶层,华人商人阶层主要从事商业零售和进出口贸易。在零售业领域,华商与当地民族的冲突同样激烈。具体而言,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在零售业领域的冲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人的商业习惯遭到指责。在以往华人商店的营业时间并未受到限制,然而随着排华形势的发展,联邦政府开始要求华人商店必须遵守八小时工作日的规定。一位当地人在写给凯恩斯邮报的文章中疾呼限制华人的商业零售,他这样描述道:在阿瑟顿高地,华人昼夜不停地销售杂货和布料,就连星期天也是如此。而白人零售店主因为雇用别人只能按时关闭营业。这样,华人在法定营业时间之余,获得丰厚的利润。白人店主则无法从涌入该地的人流中获取任何可观的商业利润。<sup>[13]</sup>针对华人的工作时长问题,一旦发现华人在法定营业时间之外经营,政府就

会对华人业主进行惩罚。除此之外,华人特殊的记账方式和金融运作方面也是备受澳洲社会的指摘。

第二,华人零售商与当地民族的雇佣关系受到限制。华人移民大都是只身前往澳洲,因此往往会雇佣当地人来帮忙照看商店。欧洲白人男性一般不愿受雇于华人,白人女性因为可以获得高于欧洲店主付出的薪酬而乐于到华人商店工作,但数量也是非常少。<sup>[14]</sup>真正受雇于华人店主的大都是澳洲土著民族,并以女性居多。显然,这种经济关系的建立有助于澳洲族群的融合。但是,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不愿意见到上述这样情况。他们将为华人工作的白人女性视为本族群当中的堕落或不道德的份子,并采取各种方式来阻止。1918 年,澳洲联邦政府颁布新的土著法令,以更好地控制和保护土著民族利益。针对华人雇佣土著民族的事实,法令规定只有获得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才能雇佣土著人。<sup>[15]</sup>除了政府行为外,澳洲工商业团体亦有此类限制华人与当地民族发生雇佣关系。其实,这种冲突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商业竞争所导致的。

第三,华人商店被滋扰的现象不断增加。政府将华人商店视为藏污纳垢之所,认为那里存在非法移民、赌博和鸦片等等,故而采取经常性的突击检查措施。但是海关部门和警察的突击检查有时却无的放矢,滋扰华人商店正常营业的行为。此外,华人商店被盗窃、抢劫或焚烧的案件层出不穷。<sup>[16]</sup>在排华高峰时期,情况则更加严重。而参与到这种排华当中的民众不仅有欧洲白人,也有不少澳洲土著民族。反映出华人与当地民族在零售业领域的激烈冲突。

与零售业比较来看,进出口贸易领域则体现出华人与当地经济的融合正在逐步发展。这可能与华人所从事的进出口贸易和澳洲整体经济的互补性有关。因此,贸易领域当中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冲突较少。这从侧面说明了华人与当地民族在经济方面的协作。1912 年,澳洲联邦政府与中华民国签署双边经贸安排,澳洲政府处于促进对华贸易的考虑,对华商的入境采取相对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sup>[17]</sup>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无论是中国方面或是澳洲方面对双边贸易往来皆采取不重视的态度。但是,“1921 年澳洲向中国派驻贸易专员,这是澳政府向中国第一次派出的常驻代表,标志着澳开始把中国当作其东方贸易的伙伴之一”。<sup>[18]</sup>当时,澳洲主流社会纷纷认为中国庞大的市场是澳洲对华贸易的绝佳机会,便鼓励人们前往中国投资。在这股投资中国的热潮中,华人更是首当其冲。先施有限公司、永安有限公司和新新有限公司三大澳洲华资企业在中国先后创立。虽然澳洲对华出口贸易的份额主要掌握在本地商人手里,但是华人对中澳贸易的推动是显著的。他们把澳洲的火腿、羊毛、饼干等其他澳洲产品带入中国市场,并将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生姜等中国产品进入澳洲市场,在中澳贸易中扮演了一种关键的互补性角色。



在白澳政策的背景下,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的经济关系在生产领域、商业领域及贸易领域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华人与欧洲白人在经济领域的冲突较之于其与土著民族的冲突更为激烈。后者很大程度上是在欧洲白人的挑唆下而与华人发生冲突。这种差异性投射到华人不同阶层身上也因此得出不同的感知。华商阶层相较于劳工阶层而言,在经济领域所承受的压力要小一些。具体而言,华人和澳洲当地民族的经济关系与自身从事行业在澳洲整体经济当中的重叠程度息息相关。经济冲突在澳洲当时社会背景下被民族冲突的表象所掩盖,经济交往的协作性亦被冲突性所占据。这种民族经济关系的形成也影响了华人与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等层面上的交往。

## 二、社会交往的排斥与接纳

华人与当地民族冲突随着白澳政策的不断发展而向社会层面上延伸,华人形象被定格为约翰·中国佬(John Chinamen),他们被指责为让澳洲当地民族堕落的始作俑者,被视为所谓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华人社会与澳洲当地社会接触的扩大,为华人社会人口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可能。华人男性与当地女性的族际通婚不断增多,华人社会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澳洲土生华人。尽管从当时的澳洲社会来看,这种跨族群的结合并不被看好,且遭致澳洲主流社会的强烈反对。但是,客观上产生的结果则是华人与当地民族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互相接纳已经开始,华人社会原先相对孤立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华人被视为澳洲“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澳洲社会对华人在赌博、鸦片及道德等方面的苛责。在赌博问题上,澳洲社会似乎将赌博视为华人的专利,欧洲白人不应参与到赌博当中。<sup>[19]</sup>可真实的情况是,警察每次对唐人街等华人赌博场所的搜查当中,都能发现欧洲白人的参与。他们逮捕到白人时,惊讶地问道:为什么星期天你们不去教堂而在这里赌博。<sup>[20]</sup>澳洲当地人便武断认为华人是导致欧洲人道德沦落的罪魁祸首,因此对华人的惩罚往往比白人严厉得多,可结果却是白人赌博的人数越来越多。虽然没有专门处理华人赌博的专门条款,但在澳洲当地诸多教派推动下相继出台的禁赌法案主要针对的是华人赌博问题。<sup>[21]</sup>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与华人有关的任何场所都成为警察突袭的目标。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的出发点都是将制止华人赌博作为避免当地民族受此影响。这从侧面说明了赌博问题影响了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

鸦片问题亦是华人备受当地社会诟病的重要方面。同赌博一样,吸食鸦片是与基督教精神相违背,澳洲社会普遍对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尤其是对华人社会吸食鸦片行为进行谴责。从种族层面来讲,对华人吸食鸦片的指责正是欧洲人、土著人对于华人移民澳洲的焦虑的体现。<sup>[22]</sup>有证据显示,澳洲联邦政府成立后,与澳洲鸦片进口量逐

年增长趋势成正比的是当地民族吸食鸦片者的持续增加。而且,当地民族通常都与华人一同吸食鸦片,这就给澳洲社会制造华人“邪恶论”提供了口实。1935年,悉尼警察在搜查华人鸦片馆时发现一名白人女性吸食鸦片,华人鸦片馆经营者和该名白人女性一同被带往警察法庭。法官对华人鸦片馆经营者说:你可以告诉你的同胞,我一点都不同情那些与白人女性进行交易的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法律将严惩此类犯罪。<sup>[23]</sup>每次在华人鸦片馆搜查出白人女性时,澳洲当地社会都用震惊来形容。与此同时,欧洲人还指责华人销售鸦片对土著民族的毒害。他们将土著民族染上吸食鸦片的习惯于华人移民澳洲画上等号,指控华人向当地土著提供劣质鸦片,却只字未言及欧洲人才是鸦片贸易的主要受益人。<sup>[24]</sup>无疑这有挑唆华人与土著民族关系之嫌疑。在这样的情势下,土著民族社会对华人的憎恶可想而知了。

除了在赌博、鸦片等问题上引发当地民族不满之外,澳洲社会还对华人卫生情况感到恐惧。社会交往当中累积的嫌隙最终衍化为暴力攻击。从土著民族和华人交往方面来讲,土著民族有因为从华人那里得不到鸦片而实施暴力攻击,<sup>[25]</sup>亦有结帮成伙劫掠华人财物的暴力事件。<sup>[26]</sup>诸如此类的暴力袭击反映出华人与土著民族紧张的民族关系。而华人与欧洲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发生的暴力事件则远甚于此。在白澳政策的背景下,欧洲人族群发动了白澳运动,并成立了相关团体组织,对华人住所、商店发起攻击。甚至,华人与欧洲人一起玩游戏也会发生冲突。<sup>[27]</sup>两个族群之间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澳洲华人与当地民族社会交往的另一侧面是融合进程的逐步推进,族际通婚则是这一进程当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由于澳大利亚对华人女性移民的严格控制,绝大多数华人男性缺少家庭生活。家庭生活的缺失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华人与当地民族交往持续深入的情况下,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通婚逐渐多了起来。无论对澳洲华人自身发展而言,还是对澳洲本土社会来讲,这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然而,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还是抱着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对当时白人女性出入于华人社区场所,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映是这是一件堕落和肮脏的事情。认为华人与白人女性之间的纠纷总有些幸灾乐祸。1906年,珀斯市的一名华人因为其情人不愿再与他交往而攻击对方而被告上法庭时,人们就表现出这种态度。<sup>[28]</sup>政府在该问题上也扮演了阻遏作用。1915年,珀斯市法院还对一位华人与白人妇女所谓的“不道德”关系进行审判。法院对该白人女子进行调查,认为她不仅自己与华人进行交往,还诱惑其他白人女子与华人交往,并判该女子两个月的监禁。而该华人否认法院对他的指控,认为自己与该女子的交往并不违反法律。但控方坚持认为该名华人带白人女性前往他的住所本身就是一种邪恶之举,因此决定对他罚款。<sup>[29]</sup>此外,澳洲政府还以“保护土著妇女”的





名义,阻止土著女性与华人的交往。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从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成百上千的白人女性与华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sup>[30]</sup>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人与澳洲当地女性的结合愈加普遍。虽然,华人与当地女性的婚姻也有其脆弱性。澳洲当地女性与华人由于不同的文化认同而导致婚姻的破裂在当时也是存在,而且由于种族关系紧张婚姻问题往往被扩大化,使得澳洲社会对于二者的结合持悲观或怀疑的态度并进行阻挠。不过,华人与白人女性的婚姻关系已经改变了澳洲社会的种族格局。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统计,1921 年华人混血人数占华人人口总数的 21%。到了 1941 年,这个比例则达到了 32%。<sup>[31]</sup>华人混血群体在华人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与澳洲本土社会的互动渐趋增多。这反映了华人与澳洲本土社会的融合程度的加深。

在社会生活方面,以往相对孤立、隔绝的澳洲华人社会开始发生变化,他们通过社会活动参与来实现与澳洲本土社会的互动。这些社会活动包括慈善、足球比赛等方面。

华人在慈善活动中会举行表演以争取款项。1926 年,在第三届阿德莱德慈善嘉年华中,华人表演了放风筝的互动,而足球比赛由白人进行,土著民族也表演了投掷飞镖。<sup>[32]</sup>在 1929 年举行的同一活动中,华人社团还派出了舞狮团来为慈善活动义演,并表示华人与其他族群一样,是一个拥有慈善传统的社群。参与澳洲社会慈善活动,可以增进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除了慈善活动,华人还参与到足球这项被视为白人喜爱的运动中来。在澳洲联赛当中,有一家俱乐部的队员就包括华人、马来人和混血人,并曾获得过 1926 年联赛的冠军。<sup>[33]</sup>由此看来,澳洲华人的社会活动不再局限于华人社群内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和接触不断扩大。

综观上述,华人与当地民族的社会交往呈现出的是排斥与接纳并存的特点。两者之间的排斥在白澳政策背景下被扩大化,华人的社会形象被丑化,被视为澳洲社会问题的祸根。但是,随着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土生华人的比例不断上升,华人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华人与当地民族的社会交往也因此突破了原有的封闭,与澳洲社会的接触面不断扩大,某些方面已被当地社会所接纳。尽管这个过程当中的摩擦不断,但是已经不如白澳政策初期那么激烈了。

### 三、文化习俗的歧视与认同

文化习俗亦是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文化差异导致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的误解和争执频频发生。具体来看,文化、宗教及教育等方面都体现了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歧视。与此同时,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的文化排斥也导致了华人社会在这些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自身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动或是被动,华人

社会在文化层面加强与澳洲社会的整合,可以被看做华人社会不断成熟和发展的表现。华人与当地民族紧张的关系因此有所缓解。

首先,澳洲社会对华人文化的误解导致双方之间的冲突。中医学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理念与西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双方理念的不同,使得中医在澳洲社会频频遭遇指责。中医医师在当时的澳洲是很难获得从业资格,造成了大多数中医医师被视为非法从医。但是,如果华人中医医师未获得澳洲医生委员会的注册,华人中医医师就要被告上法庭,并被处以罚款。<sup>[34]</sup>更为糟糕的是,华人中医医师还经常被控告过失杀人,而法庭调查的结果则是华人医生未能对症下药以致病人的意外身亡。这对华人中医医师来说简直就是种莫须有的罪名,因为从中医学来看这种治病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据此,澳洲社会认为需要严厉对待华人医生,因为中医逃避了对病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且与澳洲医学伦理背道而驰。<sup>[35]</sup>而且,如果发生白人在中医那里医治而最终病亡的话,那么中医就成为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关系紧张的因素。从根本上说,中医在澳洲的处境表明了东西方文化理念的差异是影响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

这种文化的冲突还表现在澳洲当地民族对华人信仰习俗的误解与歧视。民间信仰随着华人移民进入澳洲而被移植过来,在华人的聚集区建立起神龛、庙宇或寺院,并成为华人社群活动的中心。华人移民建立起的信仰体系亦是中华文化习俗的反映。然而,澳洲当地社会对华人信仰风俗大都抱着异样的眼光来看待。在白澳政策背景下,澳洲社会将华人视为“异教徒”,对华人宗教信仰进行贬损,排斥华人文化习俗。在他们看来,华人庙宇是华人吸食鸦片的场所,<sup>[36]</sup>并且时常发生华人帮派冲突,还因为点香而经常引起火灾,游神活动也是嘘嘘嚷嚷。这些都使他们感到不适的,因此他们相信华人神庙只是藏污纳垢之所,毫无宗教的神圣性可言。他们将华人移民的宗教信仰归结为愚昧和无知,且把华人崇拜的神明丑化。<sup>[37]</sup>诸如此类,皆可反映出澳洲当地民族对华人宗教信仰的误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心理。

澳洲当地民族对华人社会的文化仪式的偏见亦是显而易见的。华人庆祝春节少不了炮竹和烟花,各种锣鼓声震耳欲聋,一番热闹非凡的场景。但是对于澳洲其他族群来说,这就意味着持续半个月的噪音。为此他们要求政府禁止燃放烟花和炮竹,澳洲多个城市因此颁布禁止禁燃令。当然,这也遭致了华人社会的不满。至于华人春节庆祝仪式,有的人认为那是一种奇怪的庆祝仪式,抑或有人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单纯的嘉年华式狂欢活动。<sup>[38]</sup>可以看出,当地民族对华人文化习俗是缺乏认识。而且,这种热闹的气氛在种族关系笼罩下,还衍伸出一种偏见与狭隘。他们在看到华人社会如此宏大的庆祝场面的同时,想到自己的处境艰难以及华人社会持续繁荣,认为有必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状况。<sup>[39]</sup>概言之,澳洲当地民族对华人习俗



的理解在白澳政策的背景下发生了扭曲。

华人文化受到排斥还表现在澳洲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在澳洲移民政策收紧之前,华人一般将其子女送往中国接受教育。但是,澳洲政府于 1901 年制定移民限制法案后,由于华人担心自己子女在返回澳洲时被拒之门外,便不再送子女回国接受教育了。从 1904 到 1912 年间,入境的华人学生人数也仅有 91 人。<sup>[40]</sup>在此情况下,华人社会发起了创办华文教育的运动。1910 年,澳洲第一所华文学校中华学堂产生,它由陆逸主持校务,有 20 多个学生,教室设备甚佳。<sup>[41]</sup>华人社会则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母语教育,维持对自己祖国的认同。从当时来看,澳洲华文教育的产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创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洲当地社会对华人教育的限制。

其次,华人社会在宗教、文化及教育方面遭遇排挤,促使华人社会开始加强与澳洲本土社会的互动。1905 年,悉尼和墨尔本成立了华人改革协会,希望以此推进华人社会的改革。除了在社会层面提出废除鸦片的主张外,也提出华人社会在宗教、习俗及文化方面应该做出改变。尽管这种改革声音的出现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是分不开的。但是,华人社会之所以倡言改革是与当时华人在澳洲社会的处境有直接的关系。

在宗教习俗方面,华人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问题。当时的华文报《东华报》和《爱国报》就曾对华人社会的迷信进行批评。他们认为,花在宗教上的钱应该寄回到自己的县里去建立学校,协助救济家乡的饥民和孤苦老人。<sup>[42]</sup>1938 年,华人新年庆祝仪式也有了改变,大部分华人青年开始接受西方庆祝节日的方式,通过野餐聚会等方式来欢度新春。<sup>[43]</sup>这些表明澳洲华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注意与本地民族文化适应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改宗基督教,特别是混血华人大多是基督徒。这些华人基督徒更愿意接受澳洲的生活方式,认同澳洲主流社会文化。综观而言,华人社会的主动适应澳洲本土社会,反映了澳洲华人社会认同的转向。这种转向对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此之外,教育亦是华人适应澳洲社会的另一重要途径。移民政策收紧之后,尽管华人社会开始创办华文教育,但是华文教育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大多数华人都乐意将自己子女送往当地学校接受教育。当时澳洲华人社会的领导层基本上都是受英文教育出身。到 1933 年,澳洲联邦人口调查显示,华人大学生中,有两名女性,而有四名是混血华人。<sup>[44]</sup>越来越多的接受英文教育,有助于突破华人与当地民族交往的语言障碍,吸收澳洲本土文化。从教育层面上的接触与融合也为华人与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友好交往奠定了基础。

概观而言,华人与澳洲当地民族的文化关系同经济、社会方面一样,呈现出两面性的特点。在宗教、习俗和教育方面,华人与当地民族都有很大的差异,并因此产生了不少的冲突,澳洲当地民族对华人文化的歧视显而易见。在

这样的情况下,澳洲华人社会也相应做出了调整,无论这种适应策略是处于主动或是被动,都造成了 20 世纪前期华人社会的急剧变化,塑造了澳洲华人社会的认同。

#### 参考文献:

- [1]Ouyang, Yu. Chinese in Australian Fiction, 1888-1988.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08,p2.
- [2]McCalman, Iain, Alexander Cook, and Andrew Reeves. Gold: Forgotten Histories and Lost Objects of Australi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4.
- [3]The Australian Gold Rush, <http://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australian-story/austn-gold-rush>.
- [4]黄昆章.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 [5]杨进发. 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6]The Chinese Garden Nuisance, Sunday Times, Feb 18, 1912: 1.
- [7]Shooting Sensation Dispute in Chinese Garden White Man in Low Condition, Western Argus, Feb 18, 1919:30.
- [8]Brawl at Chinese Garde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 5, 1929:16.
- [9]Benton, Gregor. Chinese Migrants and Internationalism: Forgotten Histories, 1917-1945. London: Routledge, 2007, p76.
- [10]Less Than Statutory Wages, Barrier Miner, Jul 13, 1906:6.
- [11]The Chinese Vegetable and Fruit Monopol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 5, 1912:9.
- [12]张秋生.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13]Correspondence White Storekeeper V Chinese, Cairns Post, Jul 21, 1928:8.
- [14]Chinese in Sydney Employment of White Girls, Barrier Miner, Jun 10, 1910:6.
- [15]New Aboriginals Ordinance, Northern Territory Times and Gazette, Aug 17, 1918:13.
- [16]Chinese on The Rand Pillaging Stores, Zeehan and Dundas Herald, Aug 30, 1905:3.
- [17]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1944, p1.
- [18]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19]The Chinese Could Pay But the White Men Couldn't, Mirror, May 31, 1930:6.
- [20]A Chinese Raid, Barrier Miner, Jun 3, 1910:7.
- [21]杨进发. 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22]Andrew Gillett. Opium and Race Relations in Queensland, 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 Feb, 2010.
- [23]Smoking Opium Chinese and White

(下转第 131 页)



- [38]Baicker K.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State Spending[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529-544.
- [39]Martinez-Vazquez J, McNab R. 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2003, 31(9): 1597-1616.
- [40]Holmstrom B, Milgrom P.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1, 7 (special issue): 24-52.
- [41]刘剑雄.中国的政治锦标赛竞争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8, 5(3).
- [42]陶然,苏福兵,曦陆,等. 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 [J]. 管理世界. 2010,(12).
- [43]林挺进. 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J]. 公共管理研究. 2007,(5).
- [44]Oppen S, Brehm S.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J]. 2007.
- [45]Sheng Y.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Control under Authoritarianism: Explaining the Political Fortunes of Subnational Leaders in China[Z]. 2009.
- [46]宋小宁,苑德宇.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的政治经济逻辑[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9,(2).
- [47]Benassy-Quere A, Gopalraja N, Trannoy A. Tax and public input competition[J]. Economic Policy. 2007, 22(50): 385-430.
- [48]陶然,汪晖. 中国尚未完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调整与改革[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2).

责任编辑 梅瑞祥

- (上接第 96 页) Girl,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May 12, 1930:12.
- [24]Natives and Opium, Stamping Out the Evil, The West Australian, Sep 28, 1936:16.
- [25]A North Queensland Shooting Aboriginal and Chinamen, Barrier Miner, May 30, 1902:2.
- [26]Aborigines Rob Chinese Victim Beaten With Spears, The Courier-Mail, Jul 6, 1934:20.
- [27]Death of A Chinese White Man Arrested, Kalgoorlie Western Argus, Sep 17, 1912:25.
- [28]A Jealous Chinese, The Daily News, Jan 11, 1906:4.
- [29]Chinese and White Women, Kalgoorlie Western Argus, Feb 9, 1915:15.
- [30]乔瑜.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澳大利亚女性眼中的华人男性形象[J]. 历史教学,2012,(2).
- [31]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o. 35 1942-1943. Canberra: Commonwealth Bureau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1944. p324.
- [32]A Charity Carnival, The West Australian, Jun 14, 1926:10.
- [33]All White Sport. A Football League's Decision, The Register, Jan 1, 1927:12.
- [34]Alleged Chinese Doctor, Albany Advertiser, May 14, 1910:3.
- [35]Hard on The Chinese Doctor, The Queenslander, Jul 17, 1909:44.
- [36]Nothing Sacred in This Chinese Joss, The Courier Mail, Jun 11, 1941:5.
- [37]Australia's Strange Joss, The Register News Pictorial, Jul 12, 1930:7.
- [38]Chinese New Year, Cairns Post, Feb 1, 1922:5.
- [39]John Chinaman's Way, The West Australian, Dec 9, 1933:5.
- [40]Yarwood, A. T. Asian Migration to Australia: The Background to Exclusion, 1896-1923.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2.
- [41]Chinese School in Sydney,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Feb 17, 1910:7.
- [42]杨进发. 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43]Chinese New Year, Cairns Post, Feb 1, 1938:6.
- [44]Censu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30th June, 1933. Canberra: L.F. Johnston, Commonwealth Govt. Printer, 1938, pp945-947.

责任编辑 文 嵘